

“革命”到“革命文学”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革命话语传统

石 佳

摘 要:革命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全方位的变革运动。对于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文艺领域而言,“革命”所起到的深刻影响和革新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世纪以来,“革命”一词在这百年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学的底色,也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传统。本文试图从“革命”一词出发,探究“革命”作为一种话语形式自身的演变,以及在这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对“革命”一词的洗礼,进而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样貌与发展方向。

关键词:革命;革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传统

对于21世纪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革命”一词似乎已经不再那样频繁地出现在学界的讨论话语之中了;但对于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而言,“革命”一词却如一场暴风骤雨席卷了整个世纪的人类命运与历史进程。革命,给20世纪带来的是断裂、摧毁和覆灭,也是锻造、启蒙和新生。作为一种具有全方位变革性质的社会运动,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发源于西方世界,并由西方迅速向全球范围内传播辐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东西方世界的性质、形态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也无可逆转地将人类由前现代的思维传统推向了现代性的话语时代。

一、“革命”概念的来源与流变

革命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全方位的变革运动,归根到底,革命要争夺的是这些方方面面的话语掌控权力。因此,“革命话语”对于革命的实现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话语方式取决于思维模式,同时又与相应的行动准则密切相关。革命的话语自然是革命意识与理念的集中体现,并且极大地巩固并深化着革命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成果。随着革命步伐的不断前进,在革命激情与理想的推动下,自然要求建立

全新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并且逐步推动革命话语占领主流话语中心地位。而类似前者这种在革命中以推翻与变革为目标的、在社会各个方面要求重建的全新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则是某种意义上的“革命话语”,那后者以“革命话语”为武器的主流话语权争夺运动则可以看作一种“话语革命”。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在最初阶段,西方语境下的“革命”(Revolution)本是天文用语,用来描述天体的循环运动,后来引申为一种周而复始的运动状态。直至17到18世纪时期,欧洲频繁地出现了起义、暴动和政权更迭等现象,“革命”一词的含义也因此从周而复始的循环性运动演化成了断裂性和前进性的政治变革。我们不难看到,同样一个词语,却包含着相互矛盾的双重含义,这其中的悖论与张力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让“革命”这个词显现出了更为丰富的研究价值。按照一般的理解,“革命”一词必然象征着变动、断裂与向前,然而在另一层含义上却包含着“公转”这种代表着不断循环回到原点的意味。这从同一个词源而引申出来的两个词义是怎样发展演变而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又包含着哪些值得关注的历史背景呢?

据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考证,“革命”一

① [美]汉娜·阿伦特著,陈周旺译:《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词的使用经历了从天文学到政治领域的迁移,这个词的内涵也发生了从循环到进步的颠覆性转折。她在《论革命》一书中这样解释:“‘革命’一词本来是一个天文学术语,由于哥白尼《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而在自然科学中日益受到重视。在这种科学用法中,这个词保留了它精准的拉丁文意思,是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革命”一词在西方产生时本来是表达某种循环往复的意味的,并且仅限于天文学领域的使用。但由于中世纪时欧洲所流行着的类似我国古代的一种占星术,天体的循环也就开始和社会政治产生了某种关联。这种占星术实际上与我国古代的占星术十分相似,都是以天体的运行特征与轨道来推断国家以及政府相关事务的发展,无形中将星体的物理循环与政治寓言的神秘意味连接在了一起。天文相关的词汇也因此对当时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随着这一现象的发展演变,“革命”一词开始越发频繁地被运用于政治领域中去。

而“革命”政治变革意义的正式使用,应该起始于17世纪左右的欧洲,马基雅维利使用“革命”一词来表达一般政治意义上的变化。而与此同时,这个词也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各个领域。尽管如此,首次运用在政治领域时的“革命”一词,仍然没有摆脱循环往复的含义,因为对于当时笃信宗教的西方人来说,任何一种变动都不会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必然存在一种永恒的上帝的力量在这背后起着作用,推动着万物的循环。1688年英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光荣革命”,而在这一过程中所使用的“革命”一词仍然具有强烈的循环论色彩,因为在当时的“光荣革命”根本就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种针对君权正当性和荣光的复辟。真正让“革命”一词抛弃循环往复的意味,开始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前进性与断裂性的时刻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直至此时,“革命”一词才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激进、巨大、创新和进步的定义,也是在法国大革命

之后,“革命”一词才真正进入了它的现代进程。汉娜·阿伦特在书中生动地记录了这段历史:“时间是1789年7月14日晚,巴黎,当路易十六从拉罗什福科公爵利昂古尔那里得知巴士底狱陷落,一些囚犯被释放,御林军一遇平民进攻就阵前变节时,国王和他的使者之间的著名对话可称得上是微言大义。据说,国王惊呼:‘人民叛变了。’利昂古尔纠正道:‘不,陛下,人民革命了。’”此后,“革命”一词在政治上的循环论色彩逐渐淡去,开始被放在历史进步的脉络上进行思考。法国大革命后,“革命”一词的含义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广泛地运用到各种各样的场合里去,而是主要指一场符合历史发展线性趋势的、突如其来的、暴力的、进步的、创新的“革命”。至此,革命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也就正式被确定下来了。

二、马克思的“革命”话语及其实践

然而,无论现代西方“革命”的影响是怎样具有突破性,对马克思来说,其彻底性都是不够的。马克思让“革命”深入到全方位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和社会问题中去,以一种更加全面而深刻的“革命话语”,讲述了更为彻底的关于“革命”的话语。马克思不仅通过其创立的革命话语重新解释并改造世界,更以其彻底的颠覆性对“革命”一词也进行了革命。正是马克思主义为“革命”一词增加了全新的内涵。马克思对西方传统世界的斗争,从某种角度上看可以看作一场改造世界的、天翻地覆的话语革命,其所运用的武器便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

就哲学革命而言,马克思对他之前的西方哲学世界的颠覆和改造可谓是一场根本性的话语革命,实现了从理论话语到实践话语的前所未有的转向,为改造世界和人的思维提供了全新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指导。具体而言,马克思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转向实践哲学。“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③,通过批评旧哲

① [美]汉娜·阿伦特著,陈周旺译:《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美]汉娜·阿伦特著,陈周旺译:《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学的概念、功能、性质、价值追求等等方面,建立全新的哲学观念和理论,实现哲学革命。马克思曾说,“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这种具有彻底性和革命性的哲学话语将哲学从天国、神、宗教上拉了下来,转向社会、人和劳动,相应的,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建构同样是一次颠覆性的变革。这一次,马克思同样以“实践”为批判的武器,介入资本主义社会并深入洞察其最核心的内部逻辑与运行机制,找出旧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弊端和内在矛盾,揭示其固有制度的罪恶与灭亡的必然性,并以此为基础确证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的自由王国的必然到来。具体而言,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深刻剖析论述来展开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运行规律的奥秘,并以此构建了极具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全新话语理论,指明了针对现实的变革方法与实践道路。在马克思看来,“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资本主义呈现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③,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造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压迫”“贫困积累”“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现代资本奴隶制”“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不断牺牲”等革命话语。在这一社会政治经济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充满智慧地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出现了“颠倒”,人的物化现象与异化生存境况愈发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摆脱的病症,在这样的关系中,人无法做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为物役、心为

形役成为普遍性的常态。对此,马克思在多部著作中都论及了对“自由王国”的向往和对其必然到来的坚信,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自由王国有过论述,认为那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是人类解放与发展的最终归宿,而现阶段“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处在一种“人的完全丧失”的境况,激励他们“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可以说,自由王国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最终指向,“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④不仅仅是马克思向充满异化的旧世界宣战的革命话语,更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奋斗目标。

在马克思看来,“革命”必须被提高到人类解放的高度,要实现这一理想,以“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为目的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就必不可少,随着革命的不断推进,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也不断上升到新的阶段,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形象地称之为“革命的历史的火车头”。随着西方世界力量的不断增强与扩张,其现代思想观念也势不可挡地侵入并席卷着整个东方文明。19到20世纪的整个世界风起云涌、风云变幻,中国社会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动荡的世界局势之中,已被信奉了上千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论历史观,瞬间被以进化论为基底的革命意识所击溃,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反复被一往无前的革命现代性激情所激励,应运而生了一场场此起彼伏的民主革命。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2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0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中的无产阶级逐渐掌握了革命主导权,势力逐渐壮大,在中国大地上领导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历史与命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建构起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更具本土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话语”。这其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最具力量和先锋性质的革命话语之一。在那个“救亡与启蒙压倒一切”的重大历史阶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始终处于文化战场最前线,在火红的革命年代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这样定义“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革命话语”：“按照现代文学理论的学科知识架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革命话语被总结为现实主义的几条规律,文艺批评的几条原则,以及文艺的时代、民族、阶级性质,党对文艺的领导和文艺的社会作用尤其是教育与动员作用等命题,并将文艺、审美问题包裹在阶级斗争、劳动实践、物质基础等终极话语中。”这样的表述在当时拥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十足的阐释效力、巨大的理论魅力和全新的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文艺理论的诞生以及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同样象征着新生和光明的“革命文学”也应运而生了。

三、“革命”的话语与“革命文学”

观察世界历史我们会发现,革命的到来往往同时也会伴随着文学高潮的来临,革命在文学话语中充当了影响深远的角色,革命与文学就是在相互的影响与制约中记录、见证并推进着彼此的更新与发展。在世界文学的话语中,革命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了叙述内容上,更深入到了艺术手法、叙述形式与风格流派的创新之中,也随之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时代作品与重要作家,世界文学也随着革命的激变而迎来了一次次激动人心的高光时刻。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典型代表,欧洲的文学与艺术在这一时期甚至

以后的很长时间之中都被刻上了深深的烙印,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地文学的发展走向。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指出的那样：“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许多事情,以致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与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¹⁸ 19世纪以来,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与社会矛盾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并作为经典一直流传下去,其中包括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舒昂党人》、狄更斯的《双城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等,都全面而深刻地展现了革命的全景历程,表达了对于革命及其相关问题的延伸思考。再比如,我们看到俄国文学在19世纪前所未有的灿烂以及现实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都与俄国社会革命的准备与斗争过程密不可分,在此期间,还出现了俄罗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群体和最辉煌的文学成就,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乔姆斯基、托尔斯泰,等等,都是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明珠。而经历过革命与战争洗礼的文学,在鲜血与生命的浇注下,也逐渐收获了更厚重的内涵与力量。

而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艺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而言,“革命文学”的重要影响和地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革命文学不仅随着革命形势的逐步推进而占据了文艺领域的绝对主导权,还作为一种具有压倒性力量的革命话语,反过来助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吹向时代先锋号角。正如王富仁先生这样分析道,“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关系是一种偏正关系”^③,整个20世纪的“革命文学”是以近现代中国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运动为大背景而展开的。而文学一方面被卷入“革命”之中,担负起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重任,另一方面文学本身也在这漫长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革命”。中国的现代文学与现代社会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密的互动关联,正如有学者所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想象、虚构和叙述历

① 金永兵:《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革命话语》,《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6期。

[苏]列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36页。

王富仁:《河流·湖泊·海湾——革命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5期。

史与现实的方式。‘小说’有时直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齿轮和螺丝刀’‘旗帜和炸弹’),有时,却于边缘处记下了正统‘大历史’必定遗漏的苦难、挣扎与悲欢。”就这样,文学、革命、政治在不停地交叉互动中,互相博弈、相互作用,形成一股革命话语的合力,共同参与并推动着这场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而复杂的社会巨变。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文学”凭借着政治等多重社会力量一举获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最强势的革命话语,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革命文学的口号,首次可以从郭沫若的文章《我们的新文学运动》中见到,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文学的“无产阶级精神”,尽管并没有明确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却已鲜明地传达出了以“无产阶级精神”消灭“资产阶级毒龙”的要求。第一次提出“革命文学”概念的文本来自恽代英与王秋心的通信《文学与革命》^①,恽代英在书信中号召青年革命文学家们要专心投身革命实践,培育革命感情,坚定革命信念。他在信中写道:“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感情。”“自然是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的……我相信最要紧是先要一般青年能够做脚踏实地的革命家。在这些革命家中,有些感情丰富的青年,自然能写出革命的文学。”在此之后,郭沫若、成仿吾、沈雁冰、李初梨也都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有过进一步的论述。

“革命文学”的概念似乎并不难理解,它较为清晰地指向一种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受革命和政治强势指导的、表达革命话语、展现革命精神的文学样式。然而,在实际使用这个概念的过程中,却经常会遇到含混不清的现象,其指涉的范围和对象常常不能做到清晰明确。事实上,“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等等一样,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细分的话可以分成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是指在20世纪

20至30年代由近现代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所倡导的文学思潮。作为左翼革命运动的口号被提出,经创造社、太阳社等人的大力宣传倡导而广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熟知,如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李初梨等等均为较早提倡、阐释并进行理论建设的代表性作家。这时的“革命文学”概念的重心已经由“革命”转向“文学”,此时“革命文学”的推崇者们已经抱有明确的文学史目标,推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化,表明了“革命文学者”们试图将文学推向新的历史阶段的鲜明的文学史意识。我们不难看出,革命文学的推崇者们似乎是怀抱着一个共同的历史使命前行的。然而事实上,在前行的过程中,这个群体内部却并不团结。由于出身、观点,以及道路选择上的分歧等原因,这个群体在之后变得四分五裂,尤其以1928年创造社与太阳社争夺“革命文学”发明权一事为标志,再加之社会环境的动荡多变,“革命文学”一词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逐渐被新兴的文学阵营所抛弃,而是开始转而簇拥起一个新的文学概念——“无产阶级文学”。在这之后,“革命文学”一词逐渐开始销声匿迹,较少再被提及;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却从另一个角度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内涵范围向着“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思想演化。

必须承认的是,“革命文学”一词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用来指称20世纪20至30年代这段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但是实际过程中,也有很大一部人会运用“革命文学”指示一个更泛化的概念,导致这个概念的外延也在不断地拓宽,常常用来表示整个20世纪范围内的、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文学作品。洪子诚先生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广义上的“革命文学”的表述:“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规则等),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

①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前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郭沫若:《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创作周刊》第3号,1923年5月27日。

恽代英:《文学与革命》,《新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17日。

恽代英:《文学与革命》,《新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17日。

治的力量的‘体制化’,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因此,似乎可以理解为,20至30年代的左翼文学,30至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40至5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以及50至60年代的文革文学,均可以看作“革命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态。它们在文学特征上有着鲜明的共通之处,即表现为一种标志性的文学体例和写作方式,包括与左翼文艺路线紧密相连的经典化作品范式、以展现阶级斗争、劳动实践为主题、弘扬革命精神的坚定立场和叙述目的、概念化符号化的描述语言。在叙事方式上通常采取“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准则,重点描写人物的“外部环境”,如情节、环境、时代背景、民族阶级等等,较少涉及人物的情绪、意识、心理、生理等非理性的内部活动,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普遍采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充满着纯粹的精神品质和崇高的历史尊严感。“革命文学”坚守着属于自己风格的鲜明色彩,与革命同行,叙述着文学所见证的历史变动、沧桑百年。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是与革命同行的文学史,“革命”一词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历史进程,更完全地革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态势与样貌。可以说,“革命”不仅仅成为中国社会与当代文学的历史资源与话语传统,更融入20世纪新中国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社会话语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从“革命”的话语到“革命文学”,可以说是革命一步步影响与改变当代文学样貌的过程,也是文学一点点将“革命”的话语付诸实践的努力。从“革命”的话语到“革命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与实践不仅全面接纳了革命力量,也深刻地进行自我革命。当代文艺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与跳跃,但“革命”的色彩一直如影随行地伴随着文学的发展,也深深地植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灵魂。可以说,“革命”的话语与“革命”的文学是当代文艺理论与实践不容忽视的守正传统,也是未来文学前进与发展不容丢弃的初心与源泉。

作者简介:石佳,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